

论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 微观与宏观的统一性

许经勇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说到底就是宏观经济进行机制的本质转换和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其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农村商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环境条件。

我国农村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与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这两者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一方面,农村微观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使每一个承包户都能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没有这样的市场主体,就谈不上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使作为农村经济细胞的农户,真正地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实现权、责、利的统一,才有可能对市场信息的变化,作出如实而敏感的反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村微观经济基础的重新构造,是实现宏观经济运行的本质转换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倘若传统的宏观调控机制原封不动,微观经

济愈活,宏观控制就得愈死,这就必须更多地借助于行政手段,强化指令性调控,到头来也就不利于促使承包户向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方向健康发展。

我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是通过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重新构造农村微观经济基础,这就必然要发生一系列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实行农村的第二步改革,进行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

首先,第一步改革冲垮了以“政社合一”为特点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这种纵向的、封闭式的经济管理体制,既不是建立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也不是为了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它一方面担负着维护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与利益结构;另一方面又与行政指令相联系的国家宏观管理体制、物资流通体制以及其他一系列政策制度相配合。因此,伴随着农村微观经

从目前来看,只能实施第一或第二种方案。但从长远来看,以实施第三种方案为宜。这是因为:(1)我国的分税制不只是税种的划分,还存在着管理权限的下放,因此,中央和地方的利益主体地位都要强化,代征方式无法也很难适应两级相对独立的利益格局。(2)分税的目的除了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利关系以外,还在于调动地方政府精心治税、充分利用本地资源、发挥地方优势,因地制宜地办好地方事业,这就需要有一个专门从属于地方政府的税务机构,中央和地方合一的税务机构很难适应这种需要;

(3)可以增加各级机构征收上的透明度,提高征收效率,减少利益摩擦,因此机构的独立化,应作为选择目标。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分税制模式,是一项宏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我们应抓好配套工程的改革,创造条件,逐步形成充满生机活力的新模式。

(作者单位:本院财政系)

济基础的重新构造，必然要冲击与农村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相互依存的整个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管理体制，以便为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这就要求在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实现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

其次，农村第一步改革是以增强微观经济活力为重要内容。这必然使市场机制对农户行为的指导作用显著增强，农民为适应市场需求而生产的积极性日益高涨。随着农村经济的商品化与农村经济的非农业化，农民的价值观念、成本观念、盈利观念必然随之强化。与农村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相联系的农村产业结构的急剧变化，使得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对资源的配置与劳动力的需求，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并将促使农民把愈来愈多的注意力放在权衡比较利益的高低上来。虽然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还不懂什么是价值规律，但他们对价值规律作用的反应则是很敏感的。在这种背景下，市场的发育与健全，以及市场机制的形成，必然愈来愈上升为必须加以解决的主要矛盾。由此而决定的，改革农产品购销与价格体制，也就成了建立正常的市场机制与国家宏观调控机制的中心环节之一。因为我国现行的农产品价格体系，以及农产品与非农产品价格体系，形成了严重的扭曲，给农户造成了极不公平的宏观经济环境。承包户被迫在不平等的经营条件下进行生产，这就必然严重地挫伤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而为了逐步理顺价格关系与购销关系，实现宏观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转换，就必须在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基础上，深入进行第二步改革。

第三，我国农村的第一步改革是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开始的。承包制把生产自主权还给农民，使每一个家庭由过去的单纯消费单位，变成既是消费单位又是生产单位，把农户推上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实现权、责、利的高度统一，从而极大地调动了

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对商品流通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即生产自主权与交换自主权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光有生产自主权而无交换自主权，这种生产自主权是不完整的，更谈不上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这就要求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从生产领域深入到流通领域，以解决微观搞活与宏观控死之间的矛盾。虽然商品的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但却必须通过流通环节来实现。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究竟能不能实现，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流通环节起着决定性作用。当我国农村经济向着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化时，国家的宏观调控机制，就不能继续沿用过去长期实行的以行政手段为主，而必须更多地体现价值规律的要求，更多地依靠经济杠杆的作用，来引导农民的经济活动，使其和国家制定的宏观目标一致起来，这就必须在农村第一步改革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农村的第二步改革。

从80年代初期开始的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至今还远未达到既定的目标，而我国农村第二步改革也已经进行了六年多的时间。当前既要继续完成农村第一步改革尚未完成的任务，又要深入进行农村的第二步改革，只有把这两部分的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取得预期的效果。

以健全与完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为目标的我国农村第一步改革的艰巨性，集中地表现在健全与完善集体统一经营以及相应地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比之建立家庭分散经营的这一经营层次，要复杂得多、困难得多。首先，从理论上说，联产承包制的核心是个“包”字，而“包”字本身就体现着集体统一经营与家庭分散经营的有机结合。我国绝大多数地区所实行的包干到户，与家庭联产承包是有一定的质的区别的。在联产承包的情况下，承包者是在集体统一安排的生产经营计划下从事活动的；承包者使用的生

产资料基本上是由集体提供的，生产费用也是由集体按承包基数支付的：包产部分的收获物，要如数上交集体，由集体统一分配，超产部分按规定比例奖给承包者，减产则按规定扣罚承包者的劳动所得：集体主体是一个统一核算与统一分配的单位，集体统一经营在双层经营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很明显的。而在实行包干到户的情况下，承包户虽然仍然承包耕种属于集体所有的土地，但以往属于集体所有的耕畜、农机具等生产资料，则基本上折价转归农户所有，集体也不支付给承包户生产费用，承包户只须完成合同规定的提留与定购任务（其数量与承包户产量没有直接联系），其余的产品与收入全部归承包户所有，承包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单位。家庭分散经营在双层经营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很明显的，这就必然极大地削弱了集体的统一经营职能。

其次，我们这里所说的统分结合的经营体制，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即以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为基础，以社区性合作组织为依托，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农户分散经营与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经营体制。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经营既包括承包经济，又包括自营经济。后者的独立性是很强的，一般不受集体统一经营的制约。也就是说，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之后所出现的新型社区性合作经济，其双层经营体系中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并不可能覆盖农户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从演变的趋势看，双层经营体制中以村为载体的集体统一经营层次，和以户为载体的家庭分散经营层次，是两个各自独立的经济实体，即村级集体经济实体与农户家庭经济实体。而家庭经济又是由承包经济与自营经济两部分结合而成的。相对于承包经济来说，自营经济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度更高，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扩充性。农业合作化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农民所固有的两重性，即互相合作的积极性与个体

经营的积极性，将存在很长时间。为了使社区性合作经济向着有利于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关键的一环就是要妥善调节集体统一经营职能与家庭分散经营职能之间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以及村级集体经济与农户家庭经济的共同发展关系，把调动农民个人积极性与发挥集体的优越性有机结合起来，在发展农户家庭经济的同时，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这是当前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出发点。如果在宏观决策导向上，不加控制地向着扩大家庭经营与发展家庭经济的方向持续倾斜，势必逐步削弱乃至瓦解社区性合作经济，这是当前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问题。再次，实现农村第二步改革目标的艰巨性，还在于作为双层经营体制中的集体统一经营，要能够有效地发挥对家庭分散经营的管理、指导、协调、服务，就必须有相当的集体经济实力为基础；那种建立在集体经济实力薄弱基础上的集体统一经营，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明显的效果。因为这种条件下的集体统一经营，更多的是属于管理型的；而不是属于经营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健全与完善集体统一经营职能，与逐步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有机地结合起来。从一定意义上说，集体统一经营职能的健全与完善过程，就是社区性合作组织集体经济巩固与发展的过程。

农村第二步改革是为了适应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使农民从过去主要按国家计划生产转变为面向市场需求生产，从而为农村乃至城乡诸产业创造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环境条件。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过程，仍然是一个非农业部门相对扩张、农业部门相对萎缩的过程。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农村商品经济迅猛发展过程中所必然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在现代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非农业化的发展趋势，使得农业部门的资源向非农业部门转移具有客观的必然性。这就使得农业资源占总资源的比重，会呈明显的下降趋势。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增加农业劳动者人均占有的资金量,就需要补充大量的再生产资金。但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农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特别是迅速发展着的制造业在起步阶段,其所需要的资金量是很大的。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必然是以不等价交换和强制征税的形式,从农业部门中转移过来的,这就使得明显偏低的农业比较利益愈趋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要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本质转换,即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的转换,是相当困难的。

当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有计划地放开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是改革传统的农产品购销与价格管理体制,实现宏观经济调控机制的本质转换的重要条件。但是,从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条件和各方面的承受力考虑,要全面放开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实现所有农产品的完全商品化,条件还不成熟。这就只能有计划地、有步骤地放开农产品的购销与价格。特别是对其中关系国计民生特别重大的农产品,例如粮食等,只能分两步走:即首先实现粮食的半商品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向完全商品化转化。这就必须选择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即以国家定购与议价收购、平价销售与议价销售两条流通渠道作为过渡形式。较之粮食统购统销制,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其历史进步性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引入市场机制与价格信号,并通过它来刺激农民增加粮食生产,缓解粮食供求矛盾,搞活粮食产品流通。但是,在粮食购销“双轨制”中输入价格信号的同时,又会产生第三种信号,即国家定购价格与市场收购价格之间的“差价款”信号。这种“差价款”实际上表现为政府对粮食这一产品征收的“产品税”,具有税收的性质,往往会带有“逆调节”的性质。具体表现在:粮食供求越紧张,粮食市场价格与定购价格相差越悬殊,粮食的产品税额就越大,农民完成粮食定购指标的积极性就越低;相反,粮食供

求越趋于缓和,粮食定购价格与市场价格越接近(甚至前者高出后者),粮食产品税额就越少(甚至是负税),这时农民完成乃至超额完成定购指标的积极性越高。这是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不可避免会带来的消极作用。

近几年的实践经验表明,从粮食统购统销制向粮食购销与价格“双轨制”的转变,因购销价格倒挂补贴所造成的国家财政压力,不但没有减轻过,而且还有加重的趋势。国家财政始终承受着保护粮食生产者与消费者双方利益的全部重担,承受着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的全部风险。为了对粮食生产者实行倾斜政策,国家不得不以财政补贴的形式,支持国家定购价格的逐步提高,把粮农收入的增长建立在国家“二级财政分配”的基础上;为了把粮食购销价格改革引向深入,政府又不得不逐步减少国家定购的粮食数量,增加议价收购的粮食数量(目前后者所占的比重已显著超过前者),从而导致国家定购与平价销售差额缺口的不断扩大;为了不损害城市消费者利益,国家定购与平价销售的缺口部分,只能采取议购转平销的补贴。所有这些,都会日益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粮食价格补贴已从1987年的10多亿元猛增到1990年的306亿元)。

尽管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还面临着重重的困扰,但唯一的出路只能把这场改革坚定而又谨慎地进行下去。如果因为遇到某些阻力,而把改革中途停顿下来,甚至倒退到前面垄断的旧体制,必将导致粮食供求关系的更加紧张。当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1989年、1990年连续两年粮食大丰收的有利时机,加大粮食购销与价格改革的份量,扩大粮食议购议销的比重,为最终向粮食购销与价格“单轨制”转变创造条件。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